

第一章

结构性需求不足及其 特征和成因

以消费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政策,是一项于国于民皆有益的政策,只要不是从静态的“馅饼分配”出发,而是从动态的“将馅饼做大一些”的增长观念出发,这一政策就是十分有效的。

时代变化之快,令人惊讶。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大陆经济供给不足,吃饭用粮票,穿衣要布票,人们的衣食住行非常简单。城乡家庭不仅基本上没有私人的冰箱、空调、电视、电话,而且人均粮食也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人均食糖只有现在的二分之一,人均肉食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人均禽蛋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男士没有西装,女士没有化妆的消费,更谈不上私人轿车、寻呼机、手机、电脑、传真等现代信息消费品,谈不上个人花钱去游“苏杭”和“新马泰”。那时,工厂生产什么,市场上有什么,消费者就要什么,没有“卖不出去”一说,工厂只有“采购员”,不需要“推销员”,因为“短缺”是一种普遍的

现象。在这种短缺背景下，居民消费旺盛，工厂投资饥渴，好像全社会存在一种永远也不能满足的需求压力。所以，那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通过压低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缩小供求缺口；是如何控制需求的增长，抑制经济过热和因需求过旺引起的通货膨胀；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进行定量配给，让每一个人都能维持仅仅只是停留于生存的生活。所幸的是，那时人们有一种现在看来也无可指责、不怕生活苦的乌托邦精神境界，人们奢望不高，比较满足于现状。社会沉浸在一个低生活水平、低物质追求的状态。

经过 20 年的改革，到 1998 年，一切都变了。过去，老百姓买好一点的东西，要凭票，要搞关系、走后门。现在，市场上东西富足，企业生产的东西发愁卖不出去，卖家广告满天飞，降价、打折、“买一送一”现象比比皆是。在经济学讨论、企业和政府决策会上，以前研究的主题是如何应对短缺、控制通货膨胀，今天却变成了如何应对需求不足、控制通货紧缩。中国经济“走出短缺”，开始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现象，这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

在经济学上，提到“有效需求不足”时，很容易联想到 1929—1933 年西方“大萧条”的情形，很容易联想到 1936 年凯恩斯在他的名著《通论》中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主张。现在要问的是，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在中国开始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同 20 世纪之初在西方开始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有什么异同？我们如何根据这些异同，来制定更为有效的新经济政策？在政府的政策操作上，应当采取何种干预方式才能更为有效？这是本书各章要设计的问题。本章主要从“理清经济背景”的角度，集中讨论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成因、特征和一般政策指导

的原则，为以后有关章节提供一个理论分析的铺垫。

一、从全面短缺走向需求不足

1. 改革以前的全面短缺与积累和消费关系处理失误

1978 年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者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均由政府部门的统一计划决定，生产过程的投资品和消费过程的消费品实行定量分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经济中普遍存在短缺，供不应求，人们的有效需求大大超过有效供给。为了尽快摆脱这种短缺现象，上上下下急于求成，决策中表现出强烈的赶超冒进情绪，国民收入总量的分配受‘高积累、低消费’指导思想的支配，发展战略受“苏联模式”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教条的影响，社会资本积累投向偏重于工业和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所有这些做法，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它们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反而使国民经济过度重工业化，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宏观效率低下，有效供给形成缓慢并且不能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最终使经济生活中的“全面短缺”程度愈来愈高。

通过对改革以前的经济决策行为进行总结，我们发现，计划经济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偏差，是对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处理上过分‘重积累、轻消费’，经济决策的起点不是放在居民的最终消费上，而是‘为生产而生产’；当时以为只要有生产就会有消费，供给可以自动地创造出需求，政府决策明显地受“萨伊定律”的影响。下面，我们来看各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怎样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的。

“一五”期间,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8.9%,农、轻、重以及能源、运输邮电业的投资比例比较合理,消费率和积累率分别为 75.8% 和 24.2%,作为最终消费的居民消费占总消费份额在 90% 以上,年均消费增长达到 6.5%。这期间,明显重视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重视消费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但是,到了“二五”期间,经济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求快心理,实行“大跃进”和“赶超”战略,从 1958 年起,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大幅度提高积累率、降低消费份额。1958 年,消费率下降为 66.1%,1959 年和 1960 年,又进一步下调为 56.2% 和 60.4%,同时,积累率分别提高到 33.9%、43.8% 和 39.4%,这期间的消费年均增长率为 -2%。而且,资本配置偏向重工业。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的投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 36.2% 提高到 54%。加上“天灾”和“人祸”双重因素的影响,国民收入出现了年均负增长 3.1% 的严重局面。在三年调整中,为了维持国民的生存,政府不得不提高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期间消费率提高到 77.3%,积累率下降为 22.7%,消费与积累的平均比率恢复到略高于“一五”期间水平的 3.41%,消费年均增长 11%,资本配置中加大了农业投入的比重、降低了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这种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生产和结构政策,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几年中,国民收入年均增长 14.7%。“三五”期间,消费率又下调、积累率上升,消费年均增长率下降为 5% 在投资的产业结构上,重工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国民收入虽然达到了年均 8.3% 的增长率水平,但是,居民消费水平未见明显提高。“四五”、“五五”期间消费率进一步下调,分别为 67% 和 66.8%,积累率上升为 33% 和 33.2%,投资中,轻工业比重提高,重工业比重下降,生产和消费的结构矛盾不很突

出,所以,国民经济未出现如‘二五’和‘三五’期间那样强烈的大幅波动现象。但受最终消费不足的约束,经济增长也只维持在相对较低的平均水平(见下面的表 1-1、1-2)。

表 1-1 各计划期消费、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变化(%)

	一五	二五	1963—1965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七五
消费率	75.8	69.2	77.3	73.7	67	66.8	68.7	65.7
积累率	24.2	30.8	22.7	26.3	33	33.2	31.3	34.3
消费/积累	3.13	2.25	3.41	2.8	2.03	2.01	2.19	1.91
消费增长率	6.5	-2	11	5	4.9	6.8	10.7	5.7
经济增长率	8.9	-3.1	14.7	8.3	5.5	6.1	10	7.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6、第 267 和第 455 页。

上面的描述表明,除‘一五’之外,改革前在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思想的影响下,‘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思维贯穿于整个发展过程之中,消费受到明显抑制,最终消费相对不足。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强化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和短缺。短缺限制了消费增长,而政策性的消费抑制又加剧了短缺。

如前所述,改革前最终消费不足与“全面短缺”这一矛盾的现象长期并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失误。这一政策指导的理论基础,一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二是快速工业化和‘大跃进’式‘赶超’思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社会总资本配置始终是以重工业为重心,结果重工业快速增长了,农业和轻工业增长很缓慢,有时农业出现负增长。1978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52 年增长了 7.8 倍,农业

增长不到 2 倍,工业增长 16.6 倍,其中轻工业增长 10 倍,重工业增长 28.8 倍。这种“重工轻农”特别是“重重工”的发展政策导向,不仅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而且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被过多抑制,降低了最终消费需求。

表 1-2 各计划期主要产业基本建设投资比例的变化 (%)

	一五	二五	1963—1965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七五
农业	7.1	11.3	17.6	10.7	9.8	10.5	5	3.3
轻工业	6.4	6.4	3.9	4.4	5.8	6.7	6.9	7.5
重工业	36.2	54	45.9	51.1	49.6	45.9	38.5	44.3
能源工业	12.4	17.1	15.1	15.9	17.6	20.9	20.4	27.5
运输邮电业	15.3	13.5	12.7	15.4	18	12.9	13.3	13
经济增长率	8.9	-3.1	14.7	8.3	5.5	6.1	10	7.5

资料来源 同表 1-1。

正是由于农业、轻工业等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长期滞后发展,造成了消费品严重短缺,对重工业的过度投资又导致对投资品需求过旺,结果,改革以前整个经济出现消费品和投资品“全面短缺”的不良现象。不难看出,改革前消费品的全面短缺,并不是由消费过多引起的,而是由“高积累、低消费”和过度重工业化政策导致的一种低消费水平上的“短缺”现象,这一现象主要由投资过度引起。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时的计划供应、定量分配和价格方面的管制,这种短缺现象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改革前经济过程中短缺加剧的原因,不仅由于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分配政策不当,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选择上的失误,在处理积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重积累、轻消费”的思想始终支配着政府的经济政

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什么时候轻视消费,什么时候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脱离消费的生产规模再大,速度再快,产量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

2. 80 年代消费增长加快,经济中的‘全面短缺’发生变化

始于 70 年代末的改革,首要工作是调整经济结构关系,其中重要的是调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结构关系,用“生产和消费平衡发展”思想替代原来在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思想,调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结构关系的调整,带来了国民经济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快速增长。“六五”期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 8.5%,远远高于 1952 年到 1979 年年均增长率 1.9% 的水平。1985 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 1978 年的 1.6 倍和 3.6 倍。伴随着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也快速增长。“六五”期间年均增长 8.6%,其中农民消费增长 10.1%,高于改革前的任何时期,非农业居民消费增长 4.8%,与“四五”、“五五”期间的水平相比变化不大(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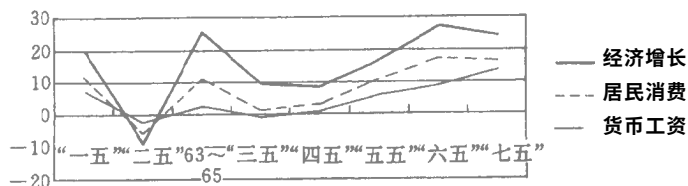


图 1-1 居民货币工资、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 同表 1-1。

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国内最终消费的快速增长。80 年代，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改革前除三年调整时期的其他任何时期，消费水平每年以很快的速度提高。首先，由于重视农业，基本消费品(粮、油、肉、蛋、水产品)的供给在 80 年代大量增加，社会人均拥有量和消费量大大提高，到 80 年代后期，基本消费品短缺现象基本消失。其次，由于重视轻工业，衣着类、日用品和家庭耐用消费品等的供给日趋丰富，短缺现象也基本得到克服。另外，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出口的加快带来了进口增长的加速，大量新型消费品进口，增加了居民消费的内容，传统的消费品从原来的短缺愈益变为供求平衡甚至供大于求。与此同时，消费率提高和积累率下降，重工业投资比重降低，使重工业对投资品的需求增长弱化，轻工业的快速扩张有重工业相对过剩生产能力为依托，所以，后来的生产性工业品的短缺程度也逐渐降低。

80 年代消费品短缺现象基本消失，不仅与这一时期的农业改革成功和结构调整带来的轻工业快速增长有关，也与制度创新和宏、微观管理改善有关，因为这种创新和改善提高了效率，在一定量的资源投入下增加了有效供给。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

“体制改革和重视消费提高行为效率→效率提高增加就业和收入→收入增加使消费增加→消费增加刺激行为效率→效率提高促使收入和积累水平提高→积累水平提高促使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能力提高促使消费品产量增加……”

所以，以消费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政策，是一项于国于民皆有益的政策，只要不是从静态的‘馅饼分配’出发，而是从动态的“将馅饼做大一些”的增长观念出发，这一政策就是十分有效的。因此，我们认为，从轻视消费到重视消费的政策转变，

为中国经济告别短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 90 年代生产能力过剩和最终需求相对不足

在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形成(积累)和消费往往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其突出点是,虽然消费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其增长速度逐渐慢于资本形成的增长。进入 90 年代后,中国居民的消费虽然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阶段,但是,资本形成的速度更快。

1991—1995 年,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 9.6%,最终需求(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年均名义增长 31.6% 国内资本形成年均名义增长速度达 43.5%,扣除物价上涨指数,实际增长 15.8%,均高于最终消费增长率(名义或实际)。同期,实际利用外资额持续增加,社会总资本积累(国内资本形成和实际利用外资)名义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48.6%,高于同期最终需求的增长速度。社会总资本积累增长快于消费和最终需求的增长,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最终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形。1995 年,彩电、电冰箱、印染布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分别只有 46.1%、50.4%、23.6%,多数行业在 40%—80% 之间,只有炼钢、乙烯、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等保持在 90% 以上。

表 1-3 显示,从 1991 年到 1996 年,包括最终消费和进出口在内的最终需求的增长,慢于包括国内资本形成和利用外资在内的社会总资本的增长,前者增长 2 倍,后者增长 2.9 倍。这无疑会产生社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形。1997 年下半年,613 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有 195 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 31.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 408 种,占 66.6%,两者合计达到 98.4%,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 1.6%。

表 1-3 1991—1996 年最终需求与社会总资本的变化 (亿元)

	最终需求			社会总资本		
	合 计	最终消费	净出口	合 计	国内资本形成	利用外资
1991	13,763.4	13,145.9	617.5	8,131.67	7,517	614.7
1992	16,227.6	15,952.1	275.5	10,694	9,636	1,058
1993	19,502.6	20,182.1	- 679.5	17,242	14,998	2,244
1994	27,850.3	27,216.2	634.1	22,985.6	19,260.6	3,725.0
1995	35,527.9	34,529.4	998.5	27,896	23,877	4,019
1996	41,631	40,171.7	1,459.3	31,421.2	26,867.2	4,554
1997	48,115.2	44,768.2	3,347.0	33,903.1	28,564.0	5,339.1

资料来源 同表 1-1。

在投资品方面，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为求生存，许多行业如家电企业间展开了激烈的“让利要市场”的削价竞销，有的行业如纺织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强制进行压锭、砸锭，减产压库；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多次降息，试图通过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但是企业的投资意愿仍然不高，全社会投资需求的增长仍然赶不上投资品供给的增长。1998 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愈益显现，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尽管政策采取一系列刺激出口的措施，但是还是出现了 8、9 月出口的大幅度负增长。在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如果出口需求快速下滑，其速度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大幅度降低，就要求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内需。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表明，刺激内需的目标不是很容易可以实现的。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告别短缺后，正在面临着愈益明显的需求约束。如何降低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缩小供求缺口，是政府今后要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

二、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的特征和成因

1. 定义和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凯恩斯于 1936 年在《通论》中论述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尽管 1998 年 3 月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以为凯恩斯的理论只不过是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概括,但是,在今天,有效需求不足终于成为中国人的共识。1998 年 7 月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题写文章,作报告 政府管理层用各种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刺激需求;企业也在想办法如何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

如果我们对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最初表现作一个追溯,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中国经济中的总供求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不是在一个时点,而是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

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经济的总供求关系变化有过两次比较突出的时期:第一次是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三年治理整顿”中出现的所谓“市场疲软”。这一次,出现了买方市场,但是持续时间不长,大约不到 3 年。1992—1993 年的加快发展,改变了买方市场的格局,出现了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形,市场中有一定程度的“过热”。但是,这一次“过热”明显不同于 1985 年和 1988 年的那两次,市场中膨胀的不是一般的消费品和常规性投资品,而是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人们抢购的不是一般的消费性实物,而是具有泡沫特征的“楼花”、地皮、外汇和其它金融性资产。第二次是 90 年代中期实行经济紧

缩以来出现的需求不足。本来，政府紧缩经济的目的一是压通胀 二是压速度 三是压泡沫 四是建立健全规范的货币、金融市场。然而这同时使整个经济转入非常明显的需求不足之中。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次的需求不足是短暂的，像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一样很快变化，还是一种常态的出现？是周期性的，还是持续性的、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需求不足？如果这种需求不足不是一种短缺现象，那么它有什么特征？

我们认为，中国在 90 年代后期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不是一种短暂现象，而是一种常态的开始，虽然在周期的扩张繁荣时期的程度要比低谷时期明显减缓，但不会消除，不会为全面短缺所代替。这有点类似于发达国家较早时期出现的需求不足现象。政策的放松可以降低需求不足的程度，供大于求的比率下降，出现一定份额的求大于供，通货紧缩转化为通货膨胀，但是，需求不足现象还是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过，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将始终表现为结构性特征，就是说，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种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

两年多以前，我们写了几篇论述中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文章，当时，我们对这一概念有一个限定词‘结构性’，就是说，中国目前存在的是‘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现在，我们还是认为，加‘结构性’这个限定词比较确切。所谓‘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是指市场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不是全面的，并非所有领域都存在供给过剩，而是有的领域存在供大于求，有的领域表现为供求平衡，有的领域可能还处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目前，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包括居民衣着、家庭耐用消费品以及大量生产资料等表现需求不足，

“买方市场”现象突出,企业库存多,厂家销售比较困难,生产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价格和市场占有率竞争。尤其是那些不适应新的消费和技术需要的“夕阳行业”,由于其生产能力还处在相对较强的旺盛时期,生产量的增长还存在较强的惯性,在相应的消费需求增长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低潮时期,容易出现典型的生产过剩现象。但是,包括交通、水利、环保、城镇公用事业、公共性文化娱乐(如公园和博物馆等)等基础设施,目前还表现为供给短缺,生产和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和需求的增长,在周期的扩张繁荣阶段,短缺现象尤为突出。属于两者之间的产业、行业和部门,在处于供求基本对应的状态,周期高潮时表现为供给短缺,周期低潮时表现为需求不足。近两年理论界所讨论的“有效需求不足”,应当是指前述“一般性工业制造品”,而不是指整个市场和所有产业。从消费结构的角度看,表现为需求不足的主要是食、衣和家庭耐用品等,住和行的供给相对不足。

如果按照经济学中对经济物品作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分类,那么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目前的“私人物品”开始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买方市场现象明显。1998年上半年,有关部门调查得到的结论是,100%的商品表现为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这应当是指可动产性工业制造品,而不是不动产、基础设施、公共物品和知识性消费品。基础设施、公共物品和知识性消费品仍是供不应求的,它们的短缺程度还很高。

上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的分析,主要着眼于“横向”,着眼于不同产业、行业和部门。如果从“纵向”角度来看,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还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就是说,表现在总量状态的有效性需求不足,在周期的低潮时期比

较显著，在扩展繁荣期则不那么显著，这主要与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周期性变化有关。通常讲的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以一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经济向下调整的过程中，就业和劳动者的收入下降比企业产量增长的下降要早一些，一旦经济开始收缩，企业销售遇到困难时收缩生产，结果开工量下降，开工下降导致就业减少，而就业减少的同时引起人均工资和福利减少，但是，由于机器运转存在惯性，销售减少时存货增加，产销率下降。这时，一方面是存货增加造成周期性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就业和收入减少导致购买力下降，特别是由人均工资下降引起的大众购买力下降，从而使市场有效需求的形成增长减速。结果，出现周期性供求缺口。在经济向上调整的过程中，就业和工资的增长会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加速，市场上的大众购买力提高，这个时候的存货减少，生产的东西很容易销售出去，企业实现的即期收入较大，工人工资的增长一般会快于企业存货的增长。所以，会出现即期市场购买力快速提高，从而有效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形。

如果分析企业对投资品的购买力变化，情形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在这里表现的是投资品供求关系周期性变化。如果将‘预期’和‘信贷’考虑进来，这种周期性特征会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消费者对就业的收入、投资者对资本的利润的预期较低，他们通常会缩小信贷消费和信贷投资的规模，这会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在经济的景气繁荣时期，消费者对就业的收入预期和投资者对资本的利润预期都会提高，这个时候，他们会扩大信贷消费和信贷投资的规模，从而导致当前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因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总供求关系，会随着经济的景气变化以及消费

者和投资者‘预期’和‘信贷’意愿的变化而变化。

当然，那些容易短缺的产业和商品，在周期低潮时期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需求不足。比如住房，199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8.8平方米和22.5平方米，比1978年的3.6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长了145%和178%，但是，绝对量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低的。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城乡居民对住房的潜在需求将会是很大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预期，住房的有效需求压力就会比较大。不过，住房长期潜在的需求压力，不排除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在房价过高、福利分房开始向货币购房转变的初期，住房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将会更为突出。

2. 一般成因

解释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是怎样形成的，实际上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一般工业制造品和私人物品的相对过剩，为什么几年以前人们还在为短缺困扰，现在却突然感到市场上东西很多。80年代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看到的现象，90年代在自己的国家也看到了。几年以前，厂长、经理们发愁的是资金，是如何从银行获取贷款，而不是如何推销产品。几年以后，资金和贷款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产品的销路。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中国，有点类似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情形。为什么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原因在哪里？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既有和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相类似的原因，又有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自身特有的原因。

其一，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不对称，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影响有效需求的增长。随着人均收入和消费

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很快，消费者的偏好不断改变，但是，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在按照计划经济条件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方式进行生产，产品结构不能随消费者的意愿变化而调整，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销路，库存惊人。统计中的“供给”包括这些库存积压品，而需求是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经济周期性收缩使需求增长放慢时，供大于求的缺口扩大，需求不足现象突出。

其二，随着经济向下调整，失业率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减速，从而影响有效需求的形成。从 1995 年到 1997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从 22.5% 和 29.4% 下降到 6.6% 和 8.5%。1998 年 1—8 月，城镇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只有 6%，农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第一季度为 2%，第二季度为负 0.7%。在这样的收入增长背景下，消费需求必然减少，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总量相对不足。

其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基本实现了温饱，城乡绝大多数居民正在从温饱向小康过渡，基本消费需要得到满足，数量型消费为质量型消费替代，消费结构需要升级的时候，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量虽然仍然有所增加，但是，每增加 1 块钱收入中用于消费的份额正在逐步减少，从而出现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在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同时，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相应提高了。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提高，这势必限制消费需求的形成。由于实行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政策，劳动者的职业和收入变成不确定，人们既担心下岗，又担心未来收入下降，加上对个人养老、子女上大学要自费等方面的考虑，所以，社会消费心理和行为发生显著变化，每增加 1 块钱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份额减少，用于储蓄的份额增加。

其四，高层次消费品价格门槛过高，影响消费结构调整过程中新增消费数量的增长。这里讲的高层次消费品，主要是指对住、行、文化等方面的消费品。在追求温饱的消费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基本上停留在数量扩充上，重点是满足衣和食，这时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总消费中的份额很高。在温饱基本满足之后，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重点是在住和行等更高层次的消费上花钱。但是，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目前的房价又太高。在北京，一套 100 平方米的三居室房子，按 6000 元/平方米售价计算，总价达 60 万人民币，这是一般工薪家庭难以承受的。如果普遍实行消费信贷，按双职工年薪 2.5 万元计算，在付 10% 的首期款后，即使一家三口不吃不喝，也要 20 多年才能还完；如果从家庭年薪中拿出 5000 元作住房积蓄，要 100 年以上才能还清房屋贷款。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老百姓不得不满足于小面积的福利住房，一部分老百姓努力节省开支存房款，并等待房价下降时再花钱购房。在这种情形下，住房购买需求不足。

其五，本次经济低潮期新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抑制了部分消费意愿。一般来说，老百姓的购买行为受预期影响，在通货膨胀预期阶段，购买意愿提高，越是涨价，购买意愿越高；在通货紧缩预期阶段，购买意愿下降，越是降价，购买意愿越低。这有点类似于股市上的“追涨杀跌”。最近几年来，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就年度来看，从 1994 年最高时的 21.7% 降到 1997 年的 0.8%；就月份来看，在 1997 年 9 月达到零通胀后，到 1998 年 9 月，价格总水平一直在负值区间运行，而且负增长率几乎是逐月加大（见表 1-4）。面对这种通货紧缩现象，老百姓的通货紧缩预期不断强化，有的消费者推迟购买，有的消费者放弃一部分购买数量，结果使全国商品零